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制度经济学研究

总第五十辑(2015年第4期)

Research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黄少安 / 主编

构建我国自主创新的新结构经济学学科体系——综述、架构与展望

付才辉

公共服务的非市场价值研究——以行政审批服务为例

杨干生 黄少安

地方财政压力：来自土地引资与融资策略的验证

李尚蒲 罗必良

中国朱格拉周期现象分析：来自1978~2013年的实证研究

刘晓曙 王婧

专业市场的经济学逻辑

盛洪

气候变迁对清代华北平原的动乱事件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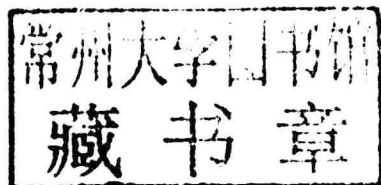
雷鸣 殷永昆 俞炜华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制度经济学研究

总第五十辑 (2015 年第 4 期)

黄少安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制度经济学研究. 2015 年. 第 4 期: 总第 50 辑/
黄少安主编.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141-6474-9

I. ①制… II. ①黄… III. ①制度经济学-文集
IV. ①F091.34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6508 号

责任编辑: 柳 敏 李一心 武晓磊
责任校对: 隗立娜
版式设计: 齐 杰
责任印制: 李 鹏

制度经济学研究

总第五十辑 (2015 年第 4 期)

黄少安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010-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87×1092 16 开 14 印张 250000 字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41-6474-9 定价: 4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881915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88191586)

电子邮箱: [dbts@ 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制度经济学研究

Journal of Research i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主 编	黄少安
学术委员会	(以汉语拼音为序)
黄少安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茅于軾	中国社会科学院
盛 洪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史晋川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张曙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张 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邹恒甫	中央财经大学
编辑部主任	李增刚
主 办 单 位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目 录

构建我国自主创新的新结构经济学学科体系

——综述、架构与展望 付才辉 (1)

公共服务的非市场价值研究

——以行政审批服务为例 杨干生 黄少安 (81)

地方财政压力：来自土地引资与融资策略的验证 李尚蒲 罗必良 (99)

谁获得了更多的转移支付？

——基于市县关系的视角 任超然 杨良松 (115)

城乡金融制度差异化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 鲁钊阳 (129)

中国朱格拉周期现象分析：来自 1978 ~ 2013 年的

实证研究 刘晓曙 王 婧 (144)

专业市场的经济学逻辑 盛 洪 (160)

气候变迁对清代华北平原的动乱事件的影响 雷 鸣 殷永昆 俞炜华 (171)

明朝白银、海洋贸易与制度内卷：解析李约瑟之谜 李小彤 蒋传海 (185)

2015 年（第十三届）中国法经济学论坛综述 司海平 褚红丽 (207)

后记 (213)

CONTENTS

- A Construct on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by Self-Dependent Innovation in China: Review, Framework
and Outlook **Fu Caihui** (79)
- Study on the Non-market Values of the Public Service-A Case Study
of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Service **Yang Gansheng** **Huang Shaoan** (98)
- The local Governments'Fiscal Pressure: The Verification on Land
Investment Introduction Strategy and Land
Financing Strategy **Li Shangpu** **Luo Biliang** (114)
- Who got More Subsidies? —Perspective from Game between
City and County Governments **Ren Chaoran** **Yang Liangsong** (128)
- The Influence from the Differentiation of Urban-Rural Financial System to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Economy **Lu Zhaoyang** (143)
- Juglar Cycle in the Macro Economy of China: Empirical Study
from 1978 – 2013 **Liu Xiaoshu** **Wang Jing** (159)
- The Economic Logic of Specialized Market **Sheng Hong** (170)
- Effects of Climatic Change on Unrest in North China Plain during
Qing Dynasty **Lei Ming** **Yin Yongkun** **Yu Weihua** (184)
- Ming Dyuasty Sliver, Ocean Trade and Institutional Involution: Understand
the Joseph Needham Puzzle **Li Xiaotong** **Jiang Chuanhai** (206)

构建我国自主创新的新结构 经济学学科体系*

——综述、架构与展望

► 付才辉** ◀

【摘 要】我国经济学学科呈现了三条脉络：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脉络、基于西方经济学的学科脉络与本土化自主理论创新的经济学科脉络。目前的发展态势也呈现三种状况：第一条学科脉络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第二条学科脉络在经济学教育领域占主导，第三条学科脉络随着中国逐步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具影响的经济体之后开始引起重视。旨在总结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转型经验的新结构经济学成为中国本土化自主理论创新的典型代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独特性体现在基于中国以及广大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自身现实约束条件分析与提炼与此约束条件相适应的经济发展与转型的过程与方法，它不同于西方主流理论以发达国家作为标杆分析发展与转型的要素与结果。新结构经济学是关于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新古典框架，核心思想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互动，核心原理则是结构变迁的价格理论，包括以禀赋结构的供给与需求为主要内容的静态和动态一般均衡理论。新结构经济学形成了以禀赋结构升级和生产结构升级作为发展过程，以企业的自生能力作为微观基础，以要素相对价格作为分析的手段，以发挥比较优势利用后发优势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方法，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作为政策导向的一套关于发展与转型的分析框架。新结构经济学具体领域的应用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新结构产业经济学、新结构金融经济学、新结构劳动经济学、新结构区域经济学、新结构国际经济学、新结构周期理论、新结构环境经济学、新结构转型经济学、新结构制度经济学、新结构国际发展学等子领域，构成了一套经济结构的科学。新结构经

* 本文主要综述了自1994年以来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文献，直接引用了新结构经济学开创者林毅夫的大量著述。感谢导师林毅夫教授的悉心指导和细致的修改建议，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徐佳君博士与陈曦博士修订了本文初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生梁方同学校对了本文。本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下新常态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5CJL025）支持。当然，文责自负。

** 付才辉，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博士后。地址：（100871）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302；E-mail: fucaihui@nsd.pku.edu.cn。

济学在这些领域有着广泛的研究前景,有望重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大部分理论体系。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 学科建设 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 F0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社会科学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个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逻辑体系。解释的现象越重要,理论的影响就越大。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强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成就更容易被认为是世界级的成就。从18世纪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英国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上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生长或生活在英国的经济学家近水楼台先得月,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多出于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的重心和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也逐渐出自美国(林毅夫,1995)。我国自1979年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6.8亿人脱贫,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并在2009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超越德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以PPP计算2014年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①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在世界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也将随之提高。

经过长足的发展,我国经济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成就斐然,在社会科学领域独占鳌头。按照教育部最新的学科分类目录,我国目前的经济学学科建设涵盖了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和十六个二级学科,建立起了相对完备的经济学学科体系。根据教育部最新的数据,2013年普通本科经济学毕业生人数达到193 530人,占总毕业人数的6.05%;经济学招生人数达223 473人,占总招生人数的5.86%;经济学在校生人数达882 890人,占总在籍生人数的5.91%;预计毕业生人数达210 209人,占总预计毕业生人数的6.01%。2013年经济学研究生毕业人数达23 226人,占总毕业人数的4.52%,其中经济学博士生毕业人数达2 328人,占总博士生毕业人数的4.38%;经济学研究生招生人数达28 007人,占总招生人数的4.54%,其中

^① 林毅夫等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成功地预测到了该历史事实。

经济学博士生招生人数达 2 919 人, 占总博士生招生人数的 4.58%; 经济学研究生在校生人数达 77 548 人, 占研究生总在校生人数的 4.32%, 其中经济学博士生在校生人数达 12 612 人, 占总博士生在校生人数的 4.23%; 经济学研究生预计毕业生人数达 29 548 人, 占总研究生预计毕业生人数的 4.44%, 其经济学博士预计毕业人数达 6 325 人, 占总博士生预计毕业人数的 4.3%。

然而, 与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学人才培养现状形成鲜明反差的是, 我国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的思潮和发展方向的影响还很有限。现有的学科架构和人才培养体系主要源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传统和西方经济学学科传统, 尚未形成基于我国以及与我国具有类似特征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转型经验的自主创新学科体系。随着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有影响的经济体, 在经济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上形成自主创新学科体系的需求和条件也将日趋成熟。作为自主理论创新的典型代表, 林毅夫开创的新结构经济学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是来自中国、很可能影响世界的理论体系, 对推进我国经济学学科建设意义重大。

相对于现有文献而言,^① 本文将对我国经济学学科发展脉络进行简要梳理, 在此基础上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背景、研究取向、研究范式、研究体系与研究进展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作出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论述, 以期从学科建设角度系统介绍新结构经济学, 为新结构经济学的后续研究提供指南, 为我国经济学学科自主创新建设与教育管理提供政策建议。

二、我国经济学学科建设状况

(一) 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发展脉络^②

新中国成立以后, 由于与苏联面临相似的条件和发展战略目标, 我国走

①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一书主要收录了阐述新结构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和政策应用的代表性论文, 林毅夫其他概述新结构经济学的文章也只是核心思想的简介, 也有大量对新结构经济学进行专题辩论和评论的文献 (可参考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11 年第 2 期克鲁格 (Krueger)、罗德里克 (Rodrik)、斯蒂格利茨 (Stiglitz) 等的评论和林毅夫的回应;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009 年第 5 期林毅夫和张夏准 (Chang) 的辩论, 以及 2011 年第 3 期上围绕新结构经济学“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 (GIF) 的专题讨论; 《经济学季刊》2013 年第 3 期韦森、张曙光、余永定、黄少安、张军等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评论与林毅夫的回应; 《经济资料译丛》2013 年第 1 期文一和王勇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评论; 《南方经济》2014 年第 1 期付才辉的评论; 《经济政策改革》(*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2015 年第 1 期关于转型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的关系所做的专题讨论), 但目前尚未有对新结构经济学的所有文献和对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可以重构的相近文献进行系统地统一梳理的工作。

② 邓慧萍 (2012) 以及何爱平和任保平 (2009) 对我国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演进做了不错的评述。

上了计划经济体制之路。^①对应地,我国的整个经济学学科体系也主要从苏联引进。1954年苏联正式出版了第一套《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材,1955年就被翻译引介入我国。这套教材在马克思《资本论》和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基础上,构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总结了苏联赶超战略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设的经验。

1956年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强调要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并结合我国国情来建设社会主义。受此影响,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于光远、林子力和孙冶方等便从1956年开始系统研究苏联教科书,结合中国国情引进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我国开始停止使用苏联教科书,掀起了新一轮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运动。影响较大的代表性教材包括1961年于光远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和姚耐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以及1963年成稿的徐禾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其后的十年“文革”期间我国经济学学科建设几乎中断。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出于为经济建设解放思想的需要,中央开始反思传统苏联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掀起了重新解释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热潮。1979年孙冶方在《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一文中,率先对斯大林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提出了质疑,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基础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批判,并于1983年出版了《社会主义经济论稿》。1979年许涤新出版了《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结合《资本论》原著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过我国一大批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有中国色彩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影响较大的代表性教材包括谷书堂主编、北方十三所高校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1979年第1版)和魏坝主编、北方十四所高校编写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1986年第1版)(即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北方本”);南方十六所大学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1979年第1版)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1980年第1版)(即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南方本”);国家教委社科司组编,吴树青、卫兴华、谷书堂和吴宣恭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1993年版,即著名的政治

^① 事实上,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不全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设想的方式进行的。1921年到1924年根据列宁思想进行的新经济政策使得苏联的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但当时苏联的工业化比重仍然很小,农业经济依然占主导。如何实现苏联的工业化,出现了“协调发展派”和“超工业化派”之间的争论,在1929年通过的五年计划之后,苏联走上了重工业赶超战略之路。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等大多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是完全照搬照抄苏联模式,但林毅夫等认为由于中国与苏联面临类似的条件或选择空间,发展战略目标的选择具有与苏联类似的过程与结果(林毅夫、蔡昉和李周,2014,第25页)。从《中国的奇迹》一书开始,新结构经济学便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认识,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内生于赶超战略,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其他采取赶超战略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内生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

经济学“教委本”)。蒋学模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86年版)、厉以宁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86年版)等也有较大影响。进入90年代以后,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打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体系,融合性地阐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要的代表性作品包括张维达主编的《政治经济学》(1999)、程恩富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2000)、逢锦聚和洪银兴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2002)。主要的经济院系也均建立了政治经济学专业。

随着新时期经济建设的变化以及西方经济学的冲击,如程恩富、林岗、张宇、马艳、蔡继明等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创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建设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入21世纪之后,全国各个高校纷纷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的研究和教学。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相应的学科建设逐渐成为常态,在官方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①

(二) 我国西方现代经济学学科体系发展脉络^②

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标志着西方经济学开始在中国的传播。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涌现了马寅初、陈岱孙、张培刚等一大批著名的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著名学者。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走上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路,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经济学学科主导,西方经济学受到批判,高等院校的西方经济学课程被取消。

20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在反思苏联政治经济学的背景下,对西方经济学全盘否定的态度开始松动,相关部门也指示让广大青年学子了解外部世界的经济情况 and 经济理论的实际情况。当时组织编写了两本西方经济学教材,一本是由人民大学的鲁友章与李宗正主编的关于西方经济学史史《经济学说史》,上册于196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下册直到1982年

^① 除了因意识形态优势而备受官方特殊重视之外,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也确实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脉络的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现实条件和实现机制问题的耕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和内在规律的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代表人物思想的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性质的读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定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的开掘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论上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汪信砚,2008)。

^② 对于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黄范章(2010)做了不错的梳理。马涛(2014)从价值观念和理论逻辑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结构及其演变做了比较全面的评述。

才出版；一本是由北京大学的罗志如、社科院的巫宝三和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鸿业主编的关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于1962～1965年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化大革命不但中断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中断了西方经济学的传播。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出于为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迫切需要，掀起了研究西方经济学的热潮。1979年由北京大学的陈岱孙为首的17位研究西方经济学及经济学说史的经济学家发起了“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组织创办西方经济学讲座，出版讲座文集，重新启蒙西方经济学。一些影响较大有代表性的著作与教材如张培刚和厉以宁合著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1980年版）、胡代光和厉以宁合著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1982年版）、刘路源和谭崇台合著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1983年版）、宋承先编著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上下册，1988年版）、高鸿业和吴易风合著的《现代经济学》（1989年版）、罗志如和范家骧等合著的《当代西方经济学》（上下册，1989年版）等等。与此同时，我国出版界也不遗余力地翻译引介西方经济学经典著作和教材，例如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西方古典经济学代表作以及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等西方权威入门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均组织翻译出版了一系列西方经济学重头著作以及《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各种《经济学手册》等经济学辞书和西方流行教材。以《经济研究》为代表的国内重要的经济学期刊不仅翻译介绍西方经济学家的著名作品，还发表了大量我国经济学家尤其是当时的中青年经济学研究者运用西方经济学分析国内重大经济问题的学术成果。大量青年学生也到西方国家留学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以林毅夫、邹恒甫、张维迎、田国强、钱颖一、洪泳森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学成后陆续回国创办新研究机构，组织留学人才开始系统讲授西方经济学，以“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为研究取向，开始努力推动中国经济学界与国际接轨（林毅夫，1995）。目前几乎所有的经济院系均开设有西方经济学学科体系的专业，从西方发达国家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的海归成为国内经济学研究队伍国际化的主力。

经过二十多年来的努力，我国经济学研究队伍在研究方法上已经与国际接轨，研究成果不断在国际一流期刊发表^①（林毅夫，2001）。主要高等院校的经济学学科建设基本上已经按照国际标准铺开。诸如新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西方新涌现的经济学流派也被迅速引进国内，不断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进展更新我国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在与国际经济学范式接轨

^① 在2012年的 *Tilburg Economics Ranking* 所有期刊发表文章排名中，大陆有3所高校经济学学科进入全球，上海财经大学发表27篇文章位居世界第65名，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各发表20篇文章位居世界第100名。

的同时,我国经济学家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也取得了大量研究中国经济乃至一般理论性问题的原创性学术研究成果,开始产生一定的国际影响,比如新结构经济学。^①

三、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背景、形成过程、研究取向与研究范式

(一)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背景^②

在全球长期的经济发展中,跨国收入差距的历史呈现出“大分流”模式。据谱瑞切特(Pritchett, 1997)估计,1870年至1990年,最富裕的国家和最贫穷的国家之间生活标准的差距比例增长了5倍以上。根据麦迪逊(Maddison, 2001)的估计,1950年至1998年,最富裕的收敛群体和最贫穷的收敛群体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比例增长了1.75倍,而按照梅耶(Mayer-Foulkes, 2002)的估计,这个比例增长了2.6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08年只有中国台湾和韩国从低收入经济体行列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再进一步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只有十三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经济体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中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是原本和发达国家差距就不大的西欧周边国家或石油生产国,其他18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绝大多数长期陷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阿吉尔等, 2012)。

面对如此糟糕的发展绩效,伊斯特利(Easterly, 2005)以散文家的口吻写道:“50年前,二战刚刚结束,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了热切的寻宝之旅,我们希望可以找到灵丹妙药,让热带雨林国家也能像欧洲和北美的富国一样富有。穷国人民的苦难和富国人民的享乐形成鲜明的反差,这激励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如果能够成功,这将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大辉煌。同过去的寻宝者一样,经济学家试图找到一个法宝能让穷国变富。许多次,我们都认为已经找到了灵丹妙药,从外国援助到直接投资,从扶持教育到控制人口,从根据改革状况提供贷款到根据改革状况减免贷款,不幸的是,一切都没有收到预期效果。那些接受我们药方的穷国没有取得意料中的进步。在我们最花力气的地区——非洲撒哈拉,经济根本没有增长;拉丁美洲和中东一度有增长,

① 林毅夫是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新结构经济学对国际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② 林毅夫(2014)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出版20周年序言中比较详细地回顾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产生的现实背景和心路历程,是这一小节的主要参考资料。

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重新陷入贫困的陷阱；南亚是另一个备受经济学家们关注的地区，无规律的经济增长使那里集聚了大量的贫困人口；最近，东亚，我们曾为之欢欣鼓舞的经济新星，也陷入了增长泥潭（一些国家但并非全部国家正在复苏）。除了热带雨林贫困国家，我们还试图将一些做法应用于前社会主义国家，但结果也非常令人沮丧。就像很多宣称找到仙丹的无稽之谈一样。”

与全球战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的糟糕绩效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自 1978 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连续 36 年年均 9.7% 的高速增长，从一个人均收入不及非洲国家平均数三分之一的贫穷落后国家，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2014 年人均收入达到 7 600 美元，期间 6.8 亿人脱贫。在一个人口这么多、底子这么薄的国家维持了这么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取得了这么多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中国有可能是继中国台湾、韩国之后第三个从低收入步入高收入的经济体。

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照搬西方主流理论倡导的“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而是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科学发展观，根据中国的国情，以渐进的方式，不断深化改革，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外不少人把中国社会、经济中存在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于没有按照西方主流理论来进行改革所致，对中国的道路和制度存疑。然而，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按照西方主流理论进行转型的苏联、东欧和亚非拉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少数在转型中取得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国家推行的却都是渐进的改革。并且，出现在中国转型期的收入分配不均、腐败等广受人们诟病的问题在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也普遍存在，甚至更为严重。

根据西方主流的理论来进行转型和发展的国家不成功，而少数成功国家的转型和发展的道路却违背了西方主流的理论。如此巨大的实践反差，给予了新结构经济学巨大的理论创新动力和机会。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自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总结，总结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理。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即使在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也常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缺憾。如果未能认识到发达国家主流理论在发展中国家运用必然存在的局限性，照搬这些理论于发展中国家实践的结果经常会事与愿违，以此为参照系来观察社会则经常会使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变为社会批评家而难以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只有总结于我国自己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败经验的理论创新，才能真正揭示我国过去的道路能够在转型期维持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原因，以及问题的根源、解决的路径和所需的制度保证（林毅夫，

2014)。

因此,我们需要以常无的心态对待教科书的理论。^①任何经济学理论如果不能有效解释人们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或者不能引领经济政策或决策以达到预期目的,就应该予以反思。^②

(二) 新结构经济学的形成过程^③

新结构经济学的雏形是林毅夫、蔡昉和李周于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对于该书的写作背景,林毅夫回忆道:“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是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地区,人多、自然资源少,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具发展希望的地区。然而日本在战后迅速恢复,到了20世纪60年代成为第一个非白种人的高收入经济体。接着东亚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到了20世纪70年代也成为充满活力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这些事实面前,世界银行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多边发展机构,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每隔4年对东亚经济进行一次主题研究,概括其独特的发展经验与教训,揭示既定时期的问题与挑战。这个系列研究中的第一个报告发表于1993年,题为《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首次系统研究了东亚8个经济发展表现卓尔不群经济体的成功原因。这8个经济体除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外还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虽然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到1993年,中国已经取得了15年年均9.7%的高速增长,在一个底子薄、人口超10亿又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取得这样的成绩在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但是《东亚奇迹》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作为中国的经济学者,我们义不容辞地以‘中国的奇迹’为题,分析了中国转型期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道理,预测了这个奇迹是否有可能持续,探讨了如何深化改革才可以将之继续保持下去”(林毅夫,2014)。

《中国的奇迹》一书系统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重工业赶超战略与当时经济发展的禀赋特征之间的政府干预矛盾,揭示了扭曲价格的宏观经济政策、资源计划配置与剥夺微观主体自主权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内生形成机制,用比较优势战略对东亚奇迹进行了重新解释,分析了改革开放之后发展战略转轨为比较优势战略与当时劳动力相对资本富裕的禀赋特征之间的

① 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可参考林毅夫的《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对话》。

② 主流经济学,尤其是发展经济学本身就是处于不断反思的过程中,可参见杰拉尔德·迈耶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04)主编的《发展经济学前沿:未来展望》,尤素夫(Yusuf, 2008)主编的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rough the Decades: A Critical Look at 30 years of the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以及各个版本的发展经济学手册(*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③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作为出版界专家,亲身编辑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多部重要著作,从另一个角度回顾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形成过程(陈昕,2015)。

相容,总结了发展战略渐进式转型的经验。^①事实上,差不多与西方主流内生增长理论与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处于同一时代,^②《中国的奇迹》一书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以禀赋结构的供给与需求、企业自生能力为核心内容的一般均衡理论。

新结构经济理论体系的第二个里程碑著作是根据2007年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讲座出版的《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该书以《中国的奇迹》一书的理论框架为基础,将基于中国经验提炼的理论推广到全球历史背景下,以发展战略遵循还是违背比较优势为出发点提出了发展与转型一系列可验证的假说,并用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对各个假说做了经验检验,绝大部分实证结果符合理论预期(林毅夫,2008)。

① 据林毅夫回忆,《中国的奇迹》一书的研究始于1988年下半年。当时中国出现了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高达18.8%和18.5%。面对高通货膨胀,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开出的药方是提高利率水平以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但是中央提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以行政手段直接砍投资、砍项目来抑制需求。这种措施造成了许多半拉子工程,从主流的理论来看甚不理性,但是在1978~1988年的10年间中国政府却能在转型过程中取得年均10.1%的高速增长,如果中国政府真是不理性的,显然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增长绩效,可见主流理论不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国家。究其原因,主流理论是建立在完善的市场前提下的,而转型中的国家并不存在完善的市场。我们在参与这场讨论的过程中,还注意到,周期性的“活乱”循环现象是中国经济的痼疾顽症,而宏观政策环境改革滞后于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方面的改革,则使这种“活乱”循环现象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所以,不抛弃完善市场的前提,并从传统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以及导致经济陷入困境的根源上进行探讨,就难以理解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对症下药地提出有效的对策。循着这个思路,我们的研究深入探索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中各种制度安排形成的内因,并逐步拓展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各个主要领域(林毅夫,2014)。

② 为了对比新结构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时间,这里有必要简要梳理一下西方主流增长与发展理论的脉络。从1776年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开始,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有两个里程碑式的标志。1874年瓦尔拉斯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开创了今天经济学教科书基本框架的一般均衡理论,企图证明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的“看不见的手”。无奈那个时代的数学水平很有限,瓦尔拉斯证明错了。1954年,德布鲁和阿罗利用数学家的成果“不动点定理”给出了一般均衡存在性的数学证明。1929年,大萧条的爆发打破了古典一般均衡理论,诞生了以总需求为核心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其后的20世纪40年代开始,以哈罗德·多玛(Harrod·Domar)模型为代表的早期开拓者使用一些基本变量构建了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总量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经济增长,他们试图使用里昂惕夫生产函数中资本和劳动的不可替代性论证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在此基础上,1956年,索罗(Solow)使用了资本和劳动可替代的标准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建立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基准索罗模型,激起了第一波对经济增长的系统分析。紧随其后,60年代中期,卡斯(Cass)和库普曼斯(Koopmans)通过内生储蓄率完成了新古典增长模型。其后,70年代以AK模型为代表的外部性增长理论认为,当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等各类资本的总和被积累时,正的外溢作用使得新古典生产函数的边际报酬递减被突破,长期增长成为可能。20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突破了新古典模型完全竞争的假定,标志性的理论突破是1989年的罗默(Romer)模型和1992年的阿洪(Aghion)与豪伊特(Howitt)的熊彼特模型,认为中间产品种类扩张以及质量改进等创新是研发投入的结果,激励机制在于持续创新的垄断租金。经济增长的动态一般均衡理论大致可以归结为上述三种基本范式(阿洪、豪伊特,2009)。林毅夫和罗森博特(Lin and Rosenblatt, 2012, table 4)也概括性地梳理了更加广泛的发展思想,可供参考。

“新结构经济学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一词由林毅夫提出和倡导。^① 2009 年 6 月林毅夫在其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的一个内部研讨会上, 以他 1994 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和 2007 年的马歇尔讲座的理论框架为基础, 反思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经济学成为一门学科以来的理论进展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与转型的成败经验, 指出第一版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重视政府的作用而忽视市场的作用和第二版的“新自由主义”发展经济学重视市场而忽视政府作用的偏颇, 提出以“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版, 强调经济发展是一个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制度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有“有效的市场”也要有“有为的政府”。2011 年 3 月, 林毅夫应邀到耶鲁大学做著名的库茨涅茨年度讲座, 以“新结构经济学: 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为题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和主要观点, 演讲全文发表于 2011 年出版的《世界银行研究观察》第 26 卷第 2 期, 向经济学界正式宣告了新结构经济学的诞生。2012 年, 林毅夫在世行的工作结束前将新结构经济学的有关论文结集为《新结构经济学: 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Policy) 一书, 系统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理论逻辑、方法框架与政策主张。基于在世界银行的工作经验以及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观察, 林毅夫出版了《繁荣的求索: 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一书, 对新结构经济学原理与应用进行了深入浅出的系统阐述。在上述三部新结构经济学的代表性作品之外, 在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上展开的大量详实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为整个理论体系做出了坚实的支撑。^②

《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更加侧重于禀赋结构供给与需求的静态一般均衡, 红线是赶超战略下重工业的禀赋结构需求与当时中国禀赋结构供给的矛盾。《经济发展与转型: 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一书则将《中国的奇迹》的分析框架扩展到了全球的历史经验。其后衍生出的《新结构经济学: 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一书更加侧重于禀赋结构供给与需求的动态一般均衡, 红线是禀赋结构升级和生产结构升级相辅相成的动态过程。因此, 新结构经济学, 在一般均衡理论中便可以称为结构变迁的价格理论。

① 按照经济学分类方法, 用现代的、新古典的方法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 应该称为“结构经济学”。将它称为“新结构经济学”, 主要是因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是“结构主义”, 称为“新结构经济学”, 便于同结构主义相区分。这样的做法在现代经济学里也有先例。道格拉斯·诺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新古典方法研究制度, 将其称为“新制度经济学”, 以便同 20 世纪初期在美国盛行一时的“制度学派”区分开。

② 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收录在林毅夫等编著的《新结构经济学文集》中。